

大学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寻求发展机遇

——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为例

薄 云

摘 要: 1929–1939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为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扩大招生范围、巩固经费来源渠道和充实教师队伍等招生、投资和管理等体制改革, 积极寻求发展机遇。其改革举措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使得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加凸显, 如大学自治问题、教师队伍中的“近亲繁殖”现象等。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策略及其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的政府资助、大学社会责任与教师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美国研究型大学; 金融危机; 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 G64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 (2009) 06–0070–07

20 世纪 20–30 年代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对 1929–1939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积极寻求发展机遇, 无论是招生、经费政策还是教师发展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其改革举措和政策调整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一流研究型大学最多的国家, 世界各国争相学习的榜样。美国研究型大学应对金融危机的发展策略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金融危机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冲击

1929–1939 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高等教育造成严重影响, 研究型大学也无一幸免, 影响较严重的是注册人数和经费来源, 进而又影响到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限于篇幅, 本文着重介绍此次金融危机对研究型大学招生、经费和教师发展等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 招生人数下降

尽管自 1929 年股市崩溃后美国经济就一直呈螺旋式下降, 但金融危机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具

有显著的滞后性。1929 年至 1932 年夏, 高等教育一直保持增长态势。1932 年秋, 公、私立大学的入学人数才跌到正常水平以下, 此后直至 1934 年底, 高等教育继续倒退。自 1935 年起, 伴随着经济的小幅度增长, 以及联邦政府的资助, 收费水平不高或不收学费的高校的入学人数开始显著增加。^[1] 同期美国研究型大学也遵循了美国大学的一般发展路径: 1932 年秋季经济形势的恶化阻碍了大量在校和准大学生的正常入学; 1934 年更为严重, 在校研究生数比 1932 年减少了 7 万人, 减幅近 10% (见表 1)。^[2] 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 培养的研究生培养数量才有所增长。以博士学位授予情况为例, 1930 年, 全美共培养 2000 多名博士, 1939 年, 单单 16 所著名大学平均每所大学每年已可以培养 100 名博士。^{[3][105]} 就毛入学率来看, 20 世纪 30 年代, 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徘徊于 12%–14% 之间, 直到 1940 年每六七个适龄青年中有一个进入大学, 毛入学率达到 15.68%, 在校生总数接近 150 万 (见表 1)。自此, 美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

(二) 经费来源渠道萎缩

一般来讲,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学生学费、社会捐赠以及其他经营性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高等院校参与扩大内需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 2009–07–10

作者简介: 薄云 (1982–), 女, 河南周口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2007 级博士研究生, 从事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厦门, 361005

收入等，其中公立大学对政府拨款、私立大学对社会捐赠及捐赠投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公、私立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对于公立研究型大学来说，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救济需要和平衡预算，各州开始大幅度削减对大学的拨款，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州立研究型大学来自州政府的拨款均低于20年代末的水平^{[3]164}：与1929年相比，1932年密歇根州削减了44%，其他州削减了15%（加州）至30%（威斯康星）不等。^{[4]248}受此影响，威斯康星大学于1932年首次减少预算，加利福尼亚、密歇根、明尼苏达等大学的经费预算也于1933-1934年达到谷底，经费支出均严重低于1929-1930年的水平。

因税收政策调整，私立研究型大学来自私人、企业和基金会等的社会捐赠也受到严重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情况详见表2）。1935年6月，为回应政治上左派的压力，罗斯福总统竭力推动国会通过“向富人敲竹杠”的税收法，强烈建议实行分等级征收公司所得税，越富有的人税率越高，并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5]33}税制改革直接冲击到私立大学的社会捐赠这一传统资金来源，使大学捐赠和遗赠

收入减少。从当时一些研究型大学公布的数据来看，加州理工、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麻省理工与斯坦福等大学的社会捐赠收入均减少了10%左右。^{[4]252}即便财力雄厚的哈佛大学，其捐赠与遗赠收入也由1931年的1560万美元减至1935年的260万美元。1936年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粗略计算，校庆纪念基金募捐活动也只募集到550万美元，仅完成其目标3000万美元的18%。^{[6]213}

表1 1930-1946年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单位：所、千人、%					
年度	学校数	注册人数			毛入学率（%） （18-21岁）
		本科	研究生	合计	
1930	1409	1054	47	1101	12.42
1932	1460	1028	78	1154	12.62
1934	1418	964	71	1055	11.20
1936	1628	1129	79	1208	12.50
1938	1690	1270	91	1351	13.96
1940	1708	1388	106	1494	15.68
1942	1720	1319	85	1404	14.68
1944	1650	1100	59	1155	12.73
1946	1768	1556	121	1677	20.84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美国历史统计[M]，[出版地不详]，1961：210 转引自：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6

表2 20世纪30年代美国基金会的捐赠投向情况

单位：万美元、%

基金	1931	1934	1937	1940
在编基金数	122	123	121	162
捐赠总值	5247.6	3421.2	3847.8	4039.0
医学与公共卫生	1862.7 (35.5)	916.7 (26.8)	1349.6 (35.1)	1227.4 (30.4)
自然科学	484.7 (9.2)	176.0 (5.1)	225.3 (5.9)	378.4 (9.4)
社会科学和经济学	403.1 (7.7)	423.8 (12.4)	232.2 (6.0)	227.8 (5.6)

注释：“（）”内数字是不同投向的捐赠占捐赠总值的比例，为笔者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Geiger R. L.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253

此外，美国私立大学一般有一半办学经费来自捐赠投资的回报，但在金融危机中，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捐赠投资也遭遇了重创。以哈佛和耶鲁为例，由于大量企业拖欠利息或股息，两所大学的投资回报率降低，收入锐减，其中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缩水18%，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则从1931-1935年的46.8万美元减至32.7万美元，缩水30%。^{[4]248}

（三）教师队伍被迫做出调整

1932年，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全面削减开支成为美国大学的共同选择，因此，几乎占大学财政预算一半的教师工资就成了大学的首要削减

对象。与此相关，调整教师队伍结构也几乎成为所有大学的共识。美国研究型大学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调整教师队伍：适当减少引进教师数量；增加教师工作量；削减教师工资；提前教师退休年龄等。尽管缺少初级教师，但美国大学补充教师队伍的意向似乎并不强烈，比较常见的做法则是增加教师工作量，由全校教师共同承担痛苦。^{[4]249}除了工作量的增加，工资的削减更是使得大学教师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整体来看，1931-1933年，美国大学教师的年均工资水平降低了15%。^{[4]249}但不同研究型大学其教师的工资削减幅度也不尽相同，其中

威斯康星大学教师的工资削减幅度为 12% - 25%；密歇根大学 1932 - 1933 年为 6% - 10%，1933 - 1934 年已提高至 8% - 20%；芝加哥大学则选择了提前教师退休年龄的办法，规定 65 岁以上教授提前退休。^{[4]249}但也有经济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抵挡了这次“减薪”、“减员”潮，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私立研究型大学。以哈佛为例，大萧条时期，其教师待遇仍旧比较稳定。1930 - 1938 年，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不仅只有哈佛的教师得到了终身教职，而且正教授的薪水从 1931 年直至二战后一直维持在 0.8 - 1.2 万美元，即便是最困难时期，哈佛也未解雇一个非终身任职教师。^{[6]208}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应对措施

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基础设施的扩建完善也基本于这一时期完成，因此，30 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通过招生、投资和管理等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来积极寻求发展机遇，比较注重“软实力”的提升。

（一）扩大招生范围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某些年份大学生源急剧减少，严重制约了大学发展。为扩大生源，美国很多大学，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偏远或欠佳的大学开始强调多种形式办学，如非全日制办学或暑期补习班（Summer Session）等，其中纽约大学注册的非全日制学生全美最多，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高于 50%。^{[3]110}为拓宽生源渠道，扩大招生范围，美国研究型大学也做出种种努力，但公、私立研究型大学所采取的方式各有侧重。

一般来讲，公立研究型大学比较强调成人和职业教育，如明尼苏达等大学通过设立与学生利益和需求相关的新课程吸引非传统学生。私立研究型大学则主要采取扩大招生区域的方式。20 世纪 30 年代，私立研究型大学在校生中本州生源所占比例很高，如 1931 年，在全美主要大学中，哈佛大学的本州生源比例最高，高达 40%。但金融危机期间，私立中学向东部院校，如常春藤联盟（均为私立大学或学院）提供的生源减少。为维持生源，私立研究型大学开始扩大招生范围，变招生区域的地方化为全国化，并通过设立奖助学金等方式吸引优秀生源。以哈佛为例，1934 年，哈佛大学开始实施全美奖学金计划，以吸引、奖励来自哈佛从未招

生过的地区（南部和西部）以及家庭背景（小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从而改变哈佛学生的社会和地域构成。^{[6]44-45}此外，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也采取了面向全国招生的办法。

（二）巩固经费来源渠道

第一，政府资助。无论公、私立高校，各级政府拨款都是其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联邦政府更是高校经费来源的重要贡献者。整体来看，1930 - 1940 年间，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经费支出增长了 6.6%，尽管低于 20 年代的增长水平，但在大学经费来源中联邦拨款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3]165}除了很多联邦机构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资助外，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其专门设立的联邦紧急救济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 FERA, 1933 年设立）、全国青年事务局（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NYA, 1935 年设立）等机构，向研究型大学提供多种形式的经费资助。1933 年 5 月，经国会授权，FERA 向各州划拨 5 亿美元，并批准各州运用联邦经费资助贫困大学生；1934 年 2 月，FERA 启动一项助学金计划，人均每月补贴 15 美元。同年，联邦救济计划推广到每个州的公、私立高校，此后，NYA 接管、扩充了该计划，并提高了研究生资助标准，即，通过从事办事员和维修等兼职工作，每人每月可挣 20 美元。就资助效果看，仅 1934 - 1935 年，就已有 1450 所高校的 10 万名兼职学生接受了联邦政府 1150 万美元的资助。^{[5]38}截至 30 年代末，大约 62 万大学生从该计划中受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 36 届（1963 - 1969）、37 届（1969 - 1974）两届总统——林顿·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等许多知名人士均曾受益于该计划。^[7]此外，20 世纪 30 年代，公共劳动委员会（Public Work Administration, PWA）还帮助大学建造宿舍，由工作促进署管理的联邦基金也为很多州立大学的研究者、新建筑提供了资助。

州政府也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资助者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在密西西比河西部公立院校占主导的州，州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经费几乎占大学总支出的 50%，但不同类型院校的生均资助标准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州政府对私立研究型大学的补助标准高于文理学院，州立大学（旗舰大学）高于非著名公立院校，而且资助标准不断提高，其中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的生均资助标准从

20世纪初的 150– 300美元提高至 1937年的 500– 1400美元，而同期规模较大的州立大学仅从 70– 200美元提高至 350– 450美元。^{[3]163}

第二，社会捐赠。美国大学社会捐赠的主要来源有基金会、校友会、企业、个人、宗教团体及其他机构等。总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以1934年前后为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捐赠收入规模大致呈“V”字形的发展轨迹。1935– 1937年，很多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捐赠收入已超过20年代末的水平，而且除密歇根大学外，私立研究型大学社会捐赠收入规模一般大于公立研究型大学。^{[4]278}如耶鲁，1931– 1932年，虽然其特别捐赠从45万美元减至35万美元，但1935– 1936年已恢复到45万美元，此后三年更是增长到65万美元。^{[4]251}哈佛大学的捐赠总量变化也呈“V”字形：1933年捐资基金规模为1亿2850万美元，1935年有所减少，为1亿2600万美元，但1940年很快恢复，并升至1亿4300万美元，几乎占哈佛收入的一半。^{[6]207}

公立研究型大学中，以密歇根大学的社会捐赠表现最为突出，仅次于芝加哥、哈佛、耶鲁等私立研究型大学。截至1939年，密歇根大学收到不同形式的社会捐赠共计4400万美元（1931– 1939年为1800万美元），占大学全部现金资产的一半，其中85%是对学校资产（包括土地、建筑及其他）的永久性捐赠。此外，这一时期密歇根大学还收到大量科研资助，如1932– 1939年指定用于科研的

社会捐赠就有160万美元。^{[4]210– 211}来自校友会的社会捐赠，即校友科研基金会也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1933– 1934年，在大学自身的科研基金从5.5万美元减至3.5万美元的情况下，校友科研基金会却为母校提供了12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其中部分用于保护金融危机期间的教师职位）。20世纪30年代末，为帮助威斯康星成为一所伟大而卓越的大学，校友科研基金会每年的贡献更是超过16万美元。^{[4]251}

第三，学费收入。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收费水平以渡过危机，但公、私立院校的提高幅度有所不同。从学费收入占政府投入和学费收入总和的比重这一指标来看，除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芝加哥等大学外，公、私立研究型大学对学生学费的依赖程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若把两类大学进行对比，我们发现，1929– 1937年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学费收入占政府投入和学费收入总和的比重为30%– 80%，而同期公立研究型大学仅为20%左右（见表3），可见私立研究型大学对学费收入的依赖程度更高。至于公、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具体收费水平，反差更是强烈。如斯坦福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学费大约为每学期115美元，而附近加州大学才25美元左右，这就直接造成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学入学率开始回升时，公立研究型大学对学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5]34}

表 3 1899– 1937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费收入 单位：万美元

大 学	1899	1909	1919	1929	1937
公立大学					
加利福尼亚	0.9 (0.05)	8.2 (0.10)	59.4 (0.19)	174.8 (0.20)	261.8 (0.24)
伊利诺伊	11.2 (0.30)	20.3 (0.23)	35.4 (0.13)	87.9 (0.15)	126.1 (0.20)
密歇根	19.2 (0.39)	32.7 (0.36)	68.2 (0.25)	120.0 (0.20)	150.1 (0.24)
明尼苏达	9.8 (0.42)	16.4 (0.20)	50.1 (0.17)	116.8 (0.19)	151.6 (0.22)
威斯康星	3.6 (0.12)	21.3 (0.18)	71.6 (0.28)	146.3 (0.26)	139.1 (0.28)
私立大学					
芝加哥	39.4 (0.59)	58.9 (0.43)	109.5 (0.44)	241.0 (0.44)	230.0 (0.42)
哥伦比亚	42.0 (0.46)	56.4 (0.44)	166.9 (0.52)	437.6 (0.55)	310.9 (0.41)
康奈尔	23.4 (0.38)	48.3 (0.42)	97.5 (0.35)	163.1 (0.29)	190.7 (0.32)
哈佛	66.9 (0.55)	64.1 (0.57)	118.7 (0.37)	327.6 (0.38)	351.7 (0.40)
约翰·霍普金斯	3.8 (0.26)	8.6 (0.28)	18.6 (0.28)	68.0 (0.34)	79.9 (0.39)
麻省理工	20.7 (0.67)	34.1 (0.81)	75.0 (0.59)	126.8 (0.43)	145.9 (0.48)
宾夕法尼亚	35.5 (0.71)	55.8 (0.55)	114.8 (0.67)	281.8 (0.74)	262.9 (0.79)
普林斯顿	15.8 (0.58)	20.1 (0.51)	42.9 (0.54)	114.7 (0.55)	121.2 (0.50)
斯坦福	3.1 (0.13)	4.5 (0.05)	32.6 (0.23)	109.1 (0.42)	160.2 (0.58)
耶鲁	48.7 (0.65)	51.6 (0.47)	70.5 (0.34)	190.0 (0.31)	216.4 (0.36)

注释：“（）”内数据为学费收入占联邦拨款与学费收入总和的比重，为笔者计算所得。

（三）充实教师队伍

受金融危机影响，社会就业形势不太乐观，工资水平也较低，因此，大学教师，尤其是初级教师相对比较容易获得。据统计，这一时期平均 60% 的博士毕业后从事高等教育领域的工作，即便是经济最不景气的 1933 年和 1934 年，这一比例也只是略有下滑，仍高达 58% 和 56%，^{[4]222-223}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美国大学教师队伍。整体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高校教师数平均增长 36%，其中 1931-1933 年增长 1.5%，1935-1939 年增长 20%，而研究型大学教师数的增长速度更快，1929-1939 年增长了 45%，高于全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增长速度。^{[4]250}优质师资的引进降低了研究型大学的生师比，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此外，美国研究型大学还善于利用国际局势，利用欧洲科技移民的契机吸纳大量知名学者，充实教师科研队伍。20 世纪 30 年代，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意大利、捷克和奥地利的一些科学家开始移民国外。以德国为例，截至 1935 年，1684 名教师（包括 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德国大学驱逐，其中很多移民到美国，这就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引进师资提供了契机。1935 年，美国一个处理紧急事件的委员会努力为避难的德国学者提供暂时的帮助，其中 15 所美国重点大学被要求接纳避难学者，并由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每人提供 2000 美元的薪水，除哈佛大学外，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参与了该计划，如芝加哥和其他大学就接收了一批重要的避难学者。^{[6]234}欧洲科技移民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移民美国的物理学家为例，“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费米等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不仅为美国带来最新研究成果，促成美国研究型大学新原子物理学中心的诞生，康奈尔大学成为原子能研究的前沿阵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主要工作于重点研究型大学，因此他们也使得当时物理学的研究团体更为集中，主要分布在芝加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掌握铀原子裂变的第一人，后曾移民美国并工作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利奥·斯茨拉德（Leo Szilard）曾联合麻省理工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两名教授，说服爱因斯坦致信总统罗斯福，以告诉总统原子裂变的重要性，体现了作为学者所具有的较强的政治敏感性与预见性。

三、研究型大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一）经费投入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

受金融危机影响，政府收入减少，加上税收政策的调整，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等经费来源均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学费收入也因生源不足受到一定影响。很多大学往往是先期资助项目一旦结束，后续研究就因资金缺乏而无法维持。同时，研究经费的投向也受到诸多限制，而且多表现为“一边倒”的倾向：

第一，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雷蒙德·弗斯狄克的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所有研究型大学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仅为 300 万美元，平均每所大学不足 7500 美元，^{[4]254}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谓是岌岌可危。

第二，重视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1930-1940 年间，联邦政府和企业对应用研究的投入远远超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其中联邦政府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增长了 200%，企业增长了 100%，大学自身也增长了 50%，直接导致应用研究经费与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比例从 4.5:1 提高到 6:1，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剧。^{[4]265}

第三，重视医学研究、生物研究，忽视其他学科的研究。大萧条期间，包括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在内的基金会都削减了对大学科研的经费资助，从表 2 可以看出，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捐赠占捐赠总额的比例一直为 10% 左右，而用于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捐赠所占比例则一直保持在 40% 左右，与此同时，企业和个人捐赠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更糟糕的是，捐赠者都试图指定其捐赠用途，如重点支持医学和生物科学研究等。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很多研究型大学不得不中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二）联邦资助对大学自治干预较多

随着联邦政府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资助的增加，其对大学的干预也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

第一，联邦资助比州资助的限制更多。危机期间，接受联邦科研资助的公立大学抱怨资助使其必须服从“长距离的管理”，并使研究方向从对地方

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偏向联邦政府所限定的问题，如医学研究和生物研究等。私立研究型大学对联邦政府的资助更为警惕，反应也比较强烈。1934年2月，尽管联邦紧急救济署的救济计划推广到每个州的公、私立高校，但是，为摆脱任何可能的政治影响，尽管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130多所私立大学还是拒绝了联邦援助，其中包括哈佛和耶鲁等研究型大学。^{[5]38}

第二，联邦资助的附加条件与要求越来越多。20世纪30年代，隶属于内政部的教育办公室宣称奉行进步主义的教育理想，要求扩大高等教育统计的收集范围，并要求统计数据标准化，以便进行全国比较。这一要求使得包括斯坦福等在内的很多私立高校把数据收集看做是对高等教育的侵犯，认为其目的是对高等教育进行中央集权控制。^{[5]39}即便是当时接受联邦农业研究资助的许多公立大学代表，包括明尼苏达大学校长、进步主义者洛特斯·科夫曼，也对联邦资助表示不满，并强烈要求“联邦资助不能被看做是州或私人支持二者择一的选择”。^{[5]42}美国研究型大学对联邦资助的诸多限制及其对大学自治的过多干预如此不满，以至于美国大学联合会（AAU）1937年年会所确立的会议主题就是讨论联邦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在联邦资助存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甚至还提出大学应重新考虑其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企业资助吸引到大学，以增补而不是代替纯研究的传统。可见，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已经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生命线，即便是在大萧条中，他们也不会轻易向外界妥协，以牺牲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代价来换取外界资助。

（三）教师队伍中“近亲繁殖”现象严重

由于就业形势不太乐观，美国绝大多数应届博士进入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工作。作为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研究型大学数量原本有限，大量博士涌入高校自然使得“近亲繁殖”现象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通病。1930年左右，除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外，威斯康星、芝加哥、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康乃尔和麻省理工等几所研究型大学中在同一所大学接受全部或部分研究生教育的教师数占教师总数的比重均较大，大约为50%—75%，而且教师级别越低，所占比例越高，如讲师所占比例从69%—84%不等，教授所占比例尽管较低，但也在10%—60%之间。^{[4]224}教师队伍中的“近亲繁殖”现象

可见一斑。

四、几点思考

20世纪3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政府资助、大学的社会责任和教师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资助策略

科研投入虽是金融危机中边际投资效率最高的一种投资，但是要讲究投资策略，即，不仅要重点发展，还要适当填平补缺，尤其要处理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费投入是美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增加人力资源积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步骤。对我国来说，目前人力资源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瓶颈”。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适当增加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投入，可大大提高边际投资效率，具有事半功倍之效。鉴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增加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投入必须坚持两点：首先要坚持“重点发展、填平补缺”的资助策略。所谓“重点发展”就是“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院校的重点实验室应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我国的“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高校，尽管近年来办学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目前大学设施还存在着很多短缺环节，如理工科教师的实验室、人文社会学科教师的工作室以及学校的危房改造等。这就要求我们在优先发展、重点投资的同时兼顾“填平补缺”，为知识创新能力、技术转化能力的提高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是要处理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关系。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诚信危机，而诚信的缺失反映出来的是人文道德素质的低下。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汇聚的研究型大学精英的诚信危机与当时上至联邦政府，下至社会各界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自然科学科研投入的倾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漠视不无关系。这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应该引以为戒的。

（二）大学应拓展社会职能，树立社会服务意识

尽管政府资助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但是在政府资助

有限或存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大学必须扩大社会开放力度，多方寻求发展机遇。从大学自身来讲，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必须不断拓展其社会职能，不仅要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更新课程体系，还要采取灵活的招生考试方式，扩大招生范围，甚至临时改变学生的就业结构等举措大幅度地吸纳优秀学生。目前，我国大幅度扩招专业学位硕士的举措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形势做出的战略调整。但大学做出的调整也不尽是被动的过程。换一角度看，大学积极服务社会的过程，也是打破大学与国家或政府之间单向依附的二元结构的过程，在大学办学过程中，只有适当引入企业、社会团体等第三方力量的支持，才可以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中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提出的“重新考虑大学与私人企业关系”的呼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研究型大学应处理好社会资助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关系。学术传统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而服务社会是大学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因此，研究型大学应该在坚守自己学术传统的同时，积极服务民族、服务社会，而且研究型大学积极融入社会的过程也是提高其自身管理效率，降低办学成本，强化社会责任的过程。

（三）高校应积极引进优质师资，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及结构的合理性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队伍。20世纪3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威斯康星等大学的校友会或基金会都曾通过经费资助等方式努力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而且客观来讲，尽管这一时期教师工资有所削减，但是教师的生活水平还是维持在较高水准，60%左右的博士选择高校就业表明了当时大学教师职业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博士就业的“扎堆”现象也造成了研究型大学“近亲繁殖”现象愈演愈烈，非常不利于研究型大学科研队伍的合理化建设，直至30年代末欧洲大量科技移民的到来，这种局面才有所缓

解。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近亲繁殖”现象，但与美国国情不同的是，我国大学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收入水平偏低现象更为普遍、突出，并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因此，如何在通过提高中青年待遇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专心于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提升大学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同时，尽量消除“近亲繁殖”现象就成了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扩大海外引智力度创造了机会，应根据我国大学专业人才需求结构重点引进欧美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博士、教师，改善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进而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 [1] 韦克特, D. 大萧条时代——1929-1941 [M]. 秦传安,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86
- [2] 刘绪贻.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06
- [3] Cohen, A. M.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the Contemporary System*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8.
- [4] Geiger, R. L.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 [5] 格温, L. S. 创建冷战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转型 [M]. 叶赋桂, 罗燕,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 [6] 凯勒, M; 凯勒, F. 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 [M]. 史静寰, 等,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 [7] Cervantes A. & M. Creusere. *Opening the Doors to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40 Years Later* [M/OL]. TG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Services November 2005: 9 [2006-12-23]. www.egslc.org/pdf/HEA-History.pdf

(责任编辑 庞青山)